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下)

逢先知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库

中 国 文 库

毛泽东年谱

(下卷)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 编 逢先知

副主编 冯 蕙 姚 旭

赵福亭 吴正裕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姚 旭 陈 廉 李兴仁

徐 焰 周炳钦 李 捷

目 录

1945 年(8 月—12 月)	(1)
1946 年	(53)
1947 年	(158)
1948 年	(263)
1949 年(1 月—9 月)	(428)
后记	(582)

1945年 五十二岁

8月10日 晚上，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1〕并告华中局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同日 二十四时，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伪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

〔1〕 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书记。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副书记。

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枝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1〕。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王首道〔2〕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1〕 蒋介石于八月十一日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就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因而,暂时和缓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决定未能实现。

〔2〕 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一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1〕，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抗击自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沿平绥线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队。晋察冀部队八月二十三日从日伪军手中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打通与晋绥军区的联系，配合长城以外的苏蒙军解放察哈尔全省。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万毅东北军〔2〕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3〕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十月三十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

〔1〕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他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四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

〔2〕 万毅，原东北军第一一师旅长，中共秘密党员。后一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万任第一一师师长。一九四三年第一一师改称滨海支队。万毅当时任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8月13日起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公开电，指出：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电报和八月十六日朱德致蒋介石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本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

已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个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4日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1〕}

8月15日 日本电台广播天皇裕仁投降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指定蒋介石享有在中国(除满洲外)受降的权力。^{〔2〕}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8月16日 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再次指出蒋介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1〕 这个条约规定,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条约还规定,经过外蒙古公民投票后,国民党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大连为“自由港”,苏联经该港进出货物“均免除关税”,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

〔2〕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的评论,本日播发。评论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唯一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2〕并告河南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同日 复蒋介石八月十四日第一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河南文年生、张启龙〔3〕并告王树声、戴季英〔4〕电,指出:“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

〔1〕 蒋介石的发言人八月十五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

〔2〕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饶漱石,当时任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治委员。曾山,当时任华中局组织部长。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3〕 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至河南新安时,正值日本投降。

〔4〕 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罗荣桓、黎玉、萧华〔1〕电:“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萧克、赵振声为常委,成仿吾、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林枫〔2〕电:李井泉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率两团到延安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八月十九日报告〔3〕的

〔1〕 罗荣桓,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黎玉、萧华,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2〕 贺龙,当时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林枫,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3〕 华中局八月十九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十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电报：“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8月22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日第二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同日 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

指示〔1〕稿中,加写了一句话:“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的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

〔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

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4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同日 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1〕:“(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电,指出:“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电,同意他们关于王震、王首道鄂南支队留在鄂南的建议。

〔1〕 粟裕,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当时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1〕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同日 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二十五日来电，复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2〕。他们离延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

〔1〕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2〕 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九月九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部。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